

特 載

從中華民國看香港問題

邵玉銘

.....
本文為本中心邵主任玉銘向最近在臺北舉行之「香港問題國際研討會」所提論文，除經《中央日報》摘要披露外，茲承邵主任另予補正並惠允由本刊刊出全文，藉供讀者參考
.....

——編者

一、香港的歷史角色

自一八四二年開始，香港即在中國現代史中扮演了一個異常複雜且兼各種矛盾於一身角色。對絕大部分中國人來說，香港是不平等條約的開始，是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標記。對英國人來說，香港則一直是大英帝國對華貿易的橋頭堡，是英國經營的皇家殖民地。

但是，對大部分的香港居民來說，香港最重要的功能，却是為他們提供了一片避難之地，使他們在洪楊之亂、軍閥混戰、日寇侵華和共黨暴政之餘能暫時棲息。對這些難民或其後代的港人來說，或許他們都沒有想到，香港已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對中國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觸發中國大陸上多次巨大的整體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變遷。換言之，香港一直是中國大陸產生改革的重要觸媒，而並不僅是一個被動的避難地。

(一) 政治觸媒的香港

近代中國大陸的政權更易，皆與香港有密切的關係。如在七十餘年以前，香港即曾對滿清專制政權的崩潰，發揮鉅大的影響。在滿清末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革派與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派，都在香港得到其改造中國傳統社會的啓示。康有為於

一八七九年到了香港實地觀察後才堅定了研究西學、立志維新的信念^①；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讀書那段日子（一八八三至一八九二年），奠定其推翻滿清專制的革命決心^②。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希望能把中國改造成如香港般市容整潔，辦事有效的亞洲新人。由於清廷的日益不能解決西方列強加諸中國的束縛，與滿清權貴的不願開放政權給予漢人，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派在一九〇五年後逐漸成爲中國政治運動的主流。在支持革命運動上，香港華人是最低不甘後人的，因爲，在海外華人支持十一次革命起義的經費，香港地區也籌措了不少的款額^③。此外，香港亦是革命思想與團體的發源地、革命宣傳的重鎮，以及策動起義的基地。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發，革命黨終於一舉推翻清廷，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打破了中國歷史中朝代循環式「只有暴動、沒有革命」的困局，爲中國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傳統——民主。這是香港在政治層面上對中國的第一次重大衝擊。

一九二二年民國成立，本是中國人民一大喜事，可是，由於袁世凱的竊國與圖謀帝制，香港便又成爲國民黨向中國大陸發動國民革命（如討袁與護法）的橋頭堡。一九二〇年三月香港機器工人大罷工，參加者逾千人，歷時十九天，使香港公用事業及交通陷於困境，洋商和港英當局不得不接受工人加薪（百分之廿五至三十）的要求，以求復工。是爲中國勞工界第一次大規模的經濟性罷工勝利，鼓舞了內地工人紛紛成立工會，有組織地團結一致爭取生活的改善和權益的保障。同年冬天，香港「中華海員慈善會」改組爲「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由孫中山先生賜名，通稱「海員工會」），以陳炳生爲主席。兩年後，香港海員再次大罷工^④。

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爆發，在全國一片反帝國主義之聲浪下，六月十九日與廿一日，香港與廣州沙面租界華工共同發起「省港大罷工」，參加人數約十餘萬，延續十六個月之久，而於一九二六年十月方告解決，使英國人再不敢輕視中國職工運動的

註① 蕭公權，「理想與現實——康有爲的社會思想」，收入蕭公權等著，「近代思想人物論——社會主義」（臺北：時報文化事業出版公司，一九八〇年初版；一九八五年，四版），頁四五至四六。

註② 有關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獲得啓發經過，見孫文，〈孫文學說〉，收入〈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一九六五年版），頁叁之一六一至一六三；入非學問無以建設——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五月七日在廣州嶺南學堂演講，同前書，第二冊，頁捌之十八至十九；入革命思想之產生——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二月在香港大學演講，同前書，第二冊，頁捌之一五六至一五七。

註③ 陳樹強，〈辛亥革命時期南洋華人支援起義經費之研究〉，「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臺北，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頁十六。本文指出此十一次革命之華僑捐款共計三百九十四萬餘港元，內中香港地區的捐款佔一百一十一萬元（百分之廿八點一五），高居首位。惟另根據該研討會蔣永敬所撰之論文〈辛亥前南洋華人對孫中山先生革命運動之支持〉，其中第十五頁記載，辛亥前自與中會到同盟會時期的十次起義經費，海外各地華人的資助以越南及暹羅爲首，而前六位中香港未被列入。

註④ 陳明鈞，〈五四與工運〉，收入汪榮祖主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七八），頁八〇至八五。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1919-1927*, tran. H. M. Wrigh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80-87.

力量^⑥。同時，內地也在此鼓舞下不斷響應，令軍閥疲於奔命。因此香港在北伐運動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是香港在政治層面上對中國大陸的第二次衝擊。

中共也曾在 一九二七年之後利用香港作為共產革命基地^⑦。

一九四六年，隨著國內政局的惡化以及逃避中共統治的內地居民紛紛候鳥南飛，便使香港的人口在四年內，從一百五十五萬暴漲至一九五〇年的二百廿三萬七千人^⑧，於是香港對中國大陸的衝擊便進入第三個階段。

在此階段中，數百萬本來是身無分文的香港居民，以他們的勤勞與刻苦，在香港政府「積極的不干涉主義」與「行政吸納政治」的制度下^⑨，以及思想、經濟自由的環境中，開創出一塊石頭的奇蹟^⑩，讓生活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人民，都認識到香港不但是通往自由的出口，更是沒有階級鬭爭的人間天堂。同時，中華民國在臺灣實施三民主義所達致的各項成就，也透過香港傳至中國大陸，使中國大陸人民瞭解到中國並不是非走馬列恩毛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可。目前，香港擔任的這個角色仍在持續之中，如何使香港今後能繼續發揮此觸使中國大陸轉向更民主、更自由的境界的功能^⑪，將是香港影響中國大陸的第四個階段工作。

(一) 經濟觸媒的香港

註⑤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五四九—五一；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2nd e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289-290; Jean Chesneau,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op. cit., pp. 290-318.

註⑥ 例如，廖承志即會長期在香港活動，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被日軍攻陷後，才喬裝逃竄入粵繼續地下活動，並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在粵北樂昌被政府逮捕。與此同時，中共南方局也被政府破獲，廣州幹部為之一空。一九四九年十月共軍攻佔廣州後翌日，迫不得已從香港調回《華商報》（中共駐港機關報）的全部工作人員（包括排字工人在內）才暫時解決了這個「幹部荒」。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四冊（臺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一九八三年增訂四版），頁三〇〇—三〇一。

註⑦ Quoted from Cheng Tong Yung, *The Economy of Hong Kong*, rev. ed. (Hong Kong: Far East Publications, 1982), p. 52.

註⑧ Ambrose Yeo-chi King, "Administration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 *Asian Survey*, Vol. XV, No. 5 (May 1975), pp. 422-439.

註⑨ 邢慕寰，《一塊石頭的奇蹟——香港經濟成長的故事》，臺北《中國時報》，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至廿一日，版二。

註⑩ 許多香港專業人士與知識分子亦有類似看法，如壓力團體「滙點」，見「民主改革與港人治港——「滙點」文件案」（香港：曙光圖書公司，一九八四年），頁一；艾凡（劉迺強），《港人治港，行！》（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六。

英國人的攫取香港，照其本身的說辭，是「重商的不列顛和平」的一部分，是經濟重於政治的^⑩。可是，隨著鴉片的大量入口與中國白銀的大量流出^⑪，便使中國在清末的國家財政受到極大戕害。更嚴重的是，各種便宜的機製洋貨透過香港輸入內地後，漸漸地從根底撕裂了中國的傳統社會。因為，在實質上這些便宜的洋貨使農村的土貨無法競爭，這對以農業為主、手工業為輔的小農經濟遭受重大的打擊^⑫。雖然，一八五六年上海開埠後，香港扮演的這個角色有漸漸被這個在長江下游更佔地利之便的城市取代的傾向，但香港仍是華南的最大轉口中心。

一九五〇年之後，香港又逐漸取代了上海的轉口港角色。同時，透過有形的商品交易與無形的資金進出，使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更趨密切。據一項研究報告說，就香港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而言，自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四年底，在中共利用外資協議金額的二百六十五億美元中，港澳地區就有六十六億美元，佔百分之二十五，在外商直接投資的一百零三億美元之中，港澳資金也佔六十五億美元，高達百分之六十三；就中共實際使用的一百五十六億外資而言，備資約佔三分之一，但大部來自香港。另一方面，就中共在香港的投資而言，近年已迅速增至三百億港元（約三十八點四億美元），投資範圍自金融、地產到百貨、出版業都包括在內^⑬。

與此同時，自一九七八年中共實施所謂的「門戶開放」政策後，香港又在若干程度上恢復了將各類消費品（如電視機、機車、冰箱、錄音機等）輸入中國大陸的轉口功能。由於中共欲改革管理體制，這幾年來不斷派遣幹部至香港「取經」，學習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一九八五年一至十二月，持中共護照來港的人數即突破十萬大關^⑭。這些幹部來港學習後回到中國大陸將有何影響，到目前雖仍屬言之過早，但高度效率的香港生猛精神，必定使這些人在心理上受到不少壓力，假以時日，使中國大陸發生意想不到的轉變，也應是可預期的事情。

（三）文化思想觸媒的香港

自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八〇七年來華辦報傳播新知後，中國的一切改革思想，不管是洪秀全所倚仗的「勸世良言

註⑩ G. B.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4), v-vi.

註⑪ 英國對中國所以能一直保持出超，鴉片貿易額實為主要因素，不過，這種壓榨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是透過直接貿易而獲致，而是英國透過其殖民地印度向中國大量輸出鴉片，再以宗主國身份要求印度以納貢和償還英國對印投資（主要為鐵路部門）之本息剝削印度而達成的。見：陳慈玉《以中印英三角貿易為基礎探討十九世紀中國的對外貿易》，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一九八四年），頁一三一—一七三。

註⑫ 費孝通也有類似看法，見《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一九四八年），頁三三—四一，頁六五—七八。

註⑬ 吳中立、董瑞麒，〈從經濟層面看香港與中共的關係〉，初稿，即將發表。

註⑭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二日，版十。

「容闈的幼童留美^①、郭嵩燾的洋務呼籲、王韜創辦《循環日報》^②與林樂知(Young J. Allen)出版《萬國公報》^③的南北互應^④，以及何啓、胡禮垣的新政改革，乃至康有為與梁啟超的變法維新、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潮，我們都可找出他們的文化思想源頭之一正是香港。康有為與孫中山先生更坦言他們的思想轉捩點，都是受香港所提供的新知所啟發而決定的。因此，香港一直都負擔了將西方思想輸入中國的功能。

民國以後，香港傳播新知的功能曾一度被上海和北京取代不少，但自一九五〇年中共全面攻佔中國大陸，大力扼殺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後，香港這個海角一隅之地，竟與中華民國共同擔負起中國文化重建的重要角色。《祖國》周刊與《民主評論》的創辦、新亞書院的成立，都是不願受中共統治的知識分子，在香港流落與哀嘆中華民族花果飄零之後的覺醒行動。一九五七年，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四位先生發表《中國文化與世界》一文^⑤，重新肯定中國文化有其世界的重要性，為開出人類新路之一個重要參考，正式樹起「新儒家」思想大旗，為以後關心中國文化演變的知識分子開闢了一條重要探究之路。今日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已對共產主義不存信心，且中共本身也有逐漸回頭向中華文化靠攏的趨勢^⑥，展望將來，香港與臺灣的「新儒家」文化，將對中國大陸思想界產生不斷的重大衝擊，而加速中國共產主義之崩潰與消失。

二、中華民國對香港問題的立場和作法

香港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而「廢除不平等條約」，正是近代中國國民革命的首要目標^⑦。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即對外發表宣言，聲稱願以正常手續，本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權宗旨，與各國改訂條約。七

註①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册)(香港：簡氏猛進書局，一九六三年)，頁二〇—二二。

註②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一九六一年)，頁七七—一二一。

註③ 同註②，頁四三—七六；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臺北：世界書局，一九七七年)，頁一〇—一五。

註④ 李贇、石麗東合著，《林樂知與萬國公報——中國現代化運動之根源》(臺北：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一九七七年)，頁一六—一八，二三—二四。

註⑤ 收入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臺北：三民書局，一九七六年，再版)，頁二五—一九二；又見於杜維明等著，《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當代研究與趨向》(臺北：時報文化事業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頁一〇三—一六一。

註⑥ 近年來中共哲學界向民族本位回歸的趨向、性質與限制，可參閱：傅偉勳，《大陸學者的哲學研究評論》，臺北《中國論壇十週年專輯》，二四一期，二二卷一期(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頁二九至三三。

註⑦ 見孫文，《國父遺囑》，收入《國父全集》，第二冊，同註②，伍之十七。

月七日，國府再宣佈已滿期的不平等條約無效，應另訂新約；未滿期者應行重訂；舊約期滿新約未定者，依「臨時辦法」處理。^②國民政府此時即與英國展開收回各租借地的交涉，所以收回中國領土一直是中華民國的基本立場。

一九三〇年，國民政府正式收回英租威海衛。透過和平談判以收回香港九龍，應是下一課題。但隨翌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在日本擴大侵華戰爭壓力下，此事暫時被耽擱下去。

一九四三年中英兩國商討簽訂「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特權條約」時，中方即曾在會議上要求將九龍租借地問題列入議程，但在英國推辭下才將此建議暫時擱置^③。一月十一日條約正式簽署，外交部長宋子文即以正式照會通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Sir Horace James Seymour)，主張「中國政府保留日後重行提出此『九龍租借地』問題之權」，期使香港島、南九龍半島和新界的歸屬，能在將來同時解決^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香港屬中國戰區，應由我國受降；張發奎將軍的部隊亦已進入新界北部，本可乘勢收回香港。但是，國民政府為求保持中英友誼，不願趁受降機會採單獨行動，以武力收回香港^⑤。所以，九月九日的香港受降典禮，才出現中英雙方代表一齊出席的場面^⑥。

這些便都表示出，中華民國一直沒有放棄過收回香港的決心與努力，而在執行上亦能以大局為重，絕不在時機尚未成熟時貿然從事。

一九五〇年一月七日，英國成為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民主國家，宣佈與中華民國斷絕正式外交關係，這使中華民國不能繼續進行收回香港的工作。不過，此舉並沒有改變中華民國收回中國領土的立場。但是，由於中華民國體認到中國大陸已存在一個不合理的政治制度，而大部分的香港同胞都不願接受中共統治，因此也一向反對香港交由中共接收。

所以，這三十多年來，中華民國所抱持的一貫立場即是：沒有臺灣問題，祇有中國問題^⑦；祇有中國問題徹底解決後，才能

註②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同註③，頁六三三。

註③ 顧維鈞，《顧維鈞談二次大戰期間關於香港問題的交涉》，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四年九月號，頁一〇。這原是《顧維鈞自傳》的部分翻譯。

註④ 轉引自關國煊，入由「中英平等新約」到「中（共）英聯合聲明」，臺北《傳記文學》，四十六卷三期（一九八五年三月號），頁一〇。

註⑤ 丘宏達，《香港法律地位之研究》，《關於中國領土的國際法問題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六年），頁一三八—一三九。

註⑥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op. cit.*, pp. 304-305; G. B. Endacott (edited and with additional material by Alan Birch), *Hong Kong Eclip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36-240.

註⑦ 蔣經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必勝必成——國慶前夕獻詞》，臺北《中央日報》，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版一；孫運璿，「中國問題與中國統一——在第十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歡迎茶會致詞」（臺北：行政院新聞局，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

解決香港問題。換言之，即是全體中國人民重獲自由民主後，香港人民當一起獲得解救。

一九八四年九月廿六日，中華民國行政院長俞國華對香港問題發表聲明，除宣稱不承認中共與英國於同日發佈之「草案」(協議)外，更表示為幫助香港僑胞應付目前所面對的命運，中華民國政府將採取以下步驟(以下為摘要)：

- (一)繼續揭發中共對港九地區的陰謀活動。
 - (二)繼續推動國際輿論以確保香港的自由繁榮，協助港九僑胞充分表達愛好自由民主，反對共產統治的意願。
 - (三)希望留在港九的僑胞更積極地為自由而奮鬥，中華民國將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路線來協助與支持。
 - (四)希望留在港九的僑胞團結一致，參與選舉，爭取自由與民主保障。
 - (五)僑務委員會已設置了「香港僑胞回國事務諮商服務處」，正展開對港九僑胞回國有關事項提供諮詢、服務與協助。
 - (六)港九僑胞可以依法申請一年期多次入出境許可。
 - (七)對於港九的反共忠貞僑胞，我們會予以隨時返國的安排。
 - (八)港九忠貞僑胞願回國定居者，我們將予以便利並協助其貸款購屋。
 - (九)港九僑胞有願回國從事投資、貿易者，我們將予以優先處理並協助。
 - (十)港九僑胞如有資金願存放在國內者，我們有境外金融中心可以提供服務，自由匯入匯出，不受任何限制。
 - (十一)港九僑胞的子女願回國就學者，我們可予以優先協助與安排^②。
-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俞國華院長更說明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一向主張中國必須統一，但是統一必須要在符合全體中國人願望的自由民主體制和繁榮均富狀況之下完成。中共對香港的政策只是短期利用香港自由港的地位，攫取大量外匯的收入，目的將這一自由地區逐步的融合於共產極權體制之下，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③。同時，在具體措施上，俞院長更表示：在必要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將採取權宜的彈性措施，協助港九僑胞專業人士回國；行政院的香港小組，由政府有關部會首長組成，已研究了各種辦法，對港九僑胞到臺定居、就業、創業與求學等問題，提出必要的幫助^④。
- 以上這些具體的聲明與作法，都明顯表示，中華民國今後將盡一切力量，以維護香港同胞的自由與幸福。

註^② 臺北《中央日報》，一九八四年九月二七日，版一。

註^③ 臺北《中央日報》，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六日，版一、二。

註^④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版一。

三、對「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批判

自一九八三年六月鄧小平首次對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提及「一國兩制」一詞^②，並透過香港談判大事宣傳後，「一國兩制」與「香港模式」便變成中共近年來的宣傳重心。儘管中共領導人一再宣稱「一國兩制」如何合理可行，但自客觀的立場分析，其內容既不合理，其前途亦無希望。

「一國兩制」是建立在幾個前提之上的，其中之一是「中國」仍是以社會主義為主體，不能變成資本主義社會；其中之一是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問題與臺灣問題之過渡階段。

就先一前提而言。所謂「中國」必須以社會主義為主體，此明顯表露中共這種「有己無人」的心態。自不信仰馬列史毛社會主義的人來看，這種主張實在是不合理的。過去三十年來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差距，中共實施社會主義的破產，在在說明社會主義的無效與無能，而中共目前却以此強求他人贊同，實在無理與自私^③。就中華民國的立場而言，未來中國必須建立在一個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與社會開放的基礎之上。

至於另一個前提——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與臺灣問題的過渡階段——更屬荒謬。因為，它是基於一個謬誤的類比推論，亦即將中華民國統治的臺灣與英國統治的香港置於同一地位。實際上，衆所週知，臺灣與香港兩者的地位絕不相同。中華民國法統之成立，遠在中共建黨之前即已存在，她一直以具國家主權性質的政治實體在國際舞臺上活動，她也有獨立自主的防衛能力。今日中華民國與中共政權的隔海對峙，不但是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對立，更是兩種意識形態透過其實踐過程與成果不斷比較的競賽。香港則是大英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以堅船利砲攫取的中國領土，其本身為一不具主權的殖民地，又無本身防衛能力，自不能與中華民國相比。

香港中文大學翁松燃教授更指出，「一國兩制」本身所具有的三大特質：(一)矛盾性；(二)壓倒性；(三)過渡性，實存在無數問題。就矛盾性而言，在一個如中共般中央集權程度甚高的社會，容忍部分地區實行其他制度的穩定性與可行性都大打折扣。就壓倒性而言，中共是堅持其主導性地位，但若港臺地區有勝過大陸而爬居主導支配地位時，北平是否仍贊同「一國兩制」，恐將很難。就過渡性而言，若「一國兩制」真的互不「吃掉」，理應沒有期限和既定的偏於一方的結論，但事實上，中共却要港臺終結過

註②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一七二〇。

註③ 鄧小平親自向楊力宇說：「當然，實現和平統一需要一定時間。如果說不急，那是假話，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早日實現。」，同註②，頁一八。

渡到社會主義之下^④。

如果再把眼光放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亦即前幾年甚囂塵上的「港人治港」的問題上，那更難給予人多少信心。因為，自去（一九八五）年六月底開始，中共駐港單位即已收到不再多提「港人治港」之指令^⑤。在此同時，當衆多已喚醒政治意識的香港中產階級熱烈參與立法局間接選舉（政制改革）時，中共方面的態度，則開始轉變。去年十月，中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指出香港未來改革，必須與界定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政制之「基本法」相銜接^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甚至批評目前香港進行代議制作法為「不按本子辦事」^⑦，這些表示使港人對中共「不予干預」的信心大降。

今（一九八六）年一月中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秘書長魯平一行訪港期間，更揚言「港人治港」四字為不科學^⑧，並非中共領導人最早提出等語^⑨。事實上，此語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已故中共「人大副委員長」、「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在會見香港廠商聯合訪問團就說過的話^⑩。其後，官鄉、姬鵬飛、鄧小平與彭真均曾提過此語^⑪。

另一方面，自去年六月開始，中共「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相繼成立以來，其間發生的種種風波，都令人懷疑中共所謂「高度自治」的可能性。因為，如十二月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的互選產生過程中，就連續發生「非法提名」、「一致贊成、鼓掌通過」、「六人出席、七人開會」等諸如此類的惡劣事件^⑫，大大違反了香港遵從「法治」（Rule of Law）的「憲治主義」傳統^⑬。故今日照此趨勢發展下去，我們即可斷言，「港人治港」終不免會淪為「港共治港」或「黨人治港」的結果。造成此一結果的其他理由還有：

（一）透過三十多年中共駐港各單位（特別是香島中學之類的左校）的培訓，即使中國大陸當局一個幹部都不派來香港，香港都

註④ 翁松然，〈一國兩制芻論——概念、性質、內容、困難和前景〉，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號），頁三四—三六。

註⑤ 社論，〈港人治港的天折〉，香港《爭鳴》月刊（一九八五年八月號），頁三。

註⑥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五年十月二〇日，版一。

註⑦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日，版四。

註⑧ 香港《明報》，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版一。

註⑨ 香港《明報》，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二日，版二。

註⑩ 同註⑨，版二。

註⑪ 官鄉、姬鵬飛言論見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版一；鄧小平，見《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八日，版一；彭真，見《大公報》，一九八五年三月三〇日，版四。

註⑫ 香港《明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八日、九日，版一。十二月十一日，中共在香港與國際壓力下，對執委成員名單實行重選。不過，透過互選過程選舉出來的執委名單，除主動退出避嫌者外，仍與許家屯、包玉剛等「非法提名」時所提名單一模一樣。

註⑬ Norman Miner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3rd e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70-72; G. B.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op. cit., pp. 229-247.

早已潛伏了數萬共產黨與親共產黨或在左派機構工作人員的第五縱隊。這幾年來中共更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為指揮中心大張旗鼓，公開聲言（以前是暗中進行）要在香港吸收黨員。

(二)透過所謂「表叔表嬸」（中共派駐香港幹部）川流不息在中國大陸與香港之間的流動，既使中共本身駐港幹部人力不足，也可指揮香港的原有幹部並結合親共港人的力量，達到「黨人治港」甚至「京人治港」的目的。事實上，「表叔壓境」正是當前的發展^④。

因此，中華民國認為中共並不具有履行「聯合聲明」的意願。無論是「一國兩制」，或是「港人治港」，都是併吞香港以及向臺灣統戰的花招而已。

四、對香港問題的幾點結論

從香港的現狀以及其過去在中國現代史中扮演的角色來看，本人對香港問題與前途，有以下四點看法：

(一)中共之收回香港，其主要目的是想將香港這塊自由土地逐漸改變為共產統治地區，以免威脅中共未來長遠的生存。

(二)就目前而言，香港是臺灣與中國大陸間最重要的接觸點，無論站在同胞愛或是以香港為跳板並進而將自由民主帶入中國大陸的立場，中華民國絕對不會放棄香港。不僅如此，中華民國已經並繼續研究各種辦法，以便在必要時，對香港僑胞提供一切協助，以抵制中共對香港同胞之欺壓行為。

(三)中華民國認為，中共今日高喊的「一國兩制」，不可能成功。因為，已如前述，其中充滿許多不可解決的矛盾和困難。同時，我們更願申言，中共欲將此一模式移植於臺灣，乃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夢想。中華民國統治的臺灣與英國實施殖民統治的香港完全不同，中華民國為一完全國際法人，有主權，有獨立自主的政府，並有充分的自衛能力。

(四)由於香港百餘年來，一直扮演觸發中國大陸變革的角色，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各層面上都曾對中國大陸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因此，中共的勉強收回香港，實為自身安裝了一個「不定時炸彈」，置自身於險境之中。因為，透過香港這個通道，一切自由民主思想與資本主義制度，甚至否定馬列史毛思想的新儒家文化，都會如水銀瀉地般傳入中國大陸。另外，中華民國的成功故事，中國大陸人民逐漸普遍知曉，這一切均將嚴重威脅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政經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使中共難以應付，終將加速其政權之崩潰。故我們認為今日之所謂香港問題，實為中華民國以自由民主統一中國之契機。

(作者識：本文之文字整理，多承同仁譚志強先生之協助，在此申謝。)

註④ 詳情可參閱香港八十年代月刊所作的兩個專輯：A表叔壓境下的中國貿易V（一九八五年二月號），頁二九~四四；B表叔壓境新形勢V（一九八五年十月號），頁五一~六七。